

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建立及其影响

赵梅春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199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摆脱了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影响所形成的以史官、史家、史籍为中心的研究与撰述模式,完成了1960年代就已开启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建构。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强调从有关历史本身认识的发展过程与史学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两方面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面貌和规律。新学科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发展,新的领域不断开拓,研究不断深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又一次发展高潮。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新体系;影响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通史撰述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15XZS001)

[作者简介]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2-0007-07 [收稿日期]2019-01-20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沉寂十年之后迎来了发展新契机;另一方面,1960年代有关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其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高潮,那么1980年代以来则是其发展的又一次高潮,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前者。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丰富方面,也体现在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新研究领域的开辟、文献资料的整理、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和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视等方面。其中,有关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史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他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一、理论上的准备

所谓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是相对于20世纪前期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影响所形成的史学史研究与撰述模式而言的。这种模式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发展趋势”为框架,偏重于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

学等方面,但“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其代表作。1980年代初,白寿彝指出“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2]^[P603]这里所说的“旧的躯壳”,就是指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影响所形成的研究与撰述模式。白寿彝认为,“从全书《中国史学史》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3]^[P166]。在他看来,只有突破这种目录解题式的史书撰述模式,中国史学史研究才有可能进入新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建立新的史学史学科并不是1980年代才提出来的新问题。早在1960年代初,因编写高校文科“中国史学史”教材的需要,史学界曾就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试图建立新的中国史学史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白寿彝提出“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是对1960年代中断的学脉之延续。

1960年代初,上海、广东、济南、西安、武汉等地纷纷召开学术座谈会、讨论会,就中国史学史的

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对象、范围、分期以及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原则等进行广泛讨论。例如,广东历史学会参加讨论会的学者一致认为,史学史的范围、内容应该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在有关史学史的任务、中国史学分期的标准和阶段的划分等问题上,刘节、陈干钧、曾庆鉴等学者却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4]。

北京地区学者的有关讨论,重视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讨,认为中国史学史应包括历史观点、史学思想、史料学的发展、史书体裁的发展、有关史书编写的制度等;至于中国史学史教科书的编写,应尽力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又要有不同于前人的崭新面貌,绝不是史籍介绍、史家传记和史观的简单排比^[5]。在研讨会之外,耿淡如、师宁、白寿彝、汪伯岩、刘节、朱永嘉等学者分别撰文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例如,耿淡如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中指出,史学史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应阐明历史学科的发展规律性,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应有所区别,其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研究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学科,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论进行研究;应分析历史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对资产阶级伪史学进行斗争^[6]。这里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包括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以及史学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白寿彝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将史学遗产概括为七个花圃:关于史学的基本观点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对于史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对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这七个花圃实际上就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在《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寿彝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2] [P595-597]}。汪伯岩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一文中将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史学家和史学流派、历史著作、体裁、历史编写制度和组织以及史学发展与经济、政治的

联系。在这里,史家、史书虽然仍被视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强调有关史家、史学流派的研究要结合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着重探讨其史学思想;有关史书研究,应区分精华与糟粕,评价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这五个方面,作者认为可以分别进行研究,若综合叙述则要分清主次,即“以时代为纲,以史家、史籍、史体和历史编纂组织为纬,而以阶级斗争作为贯串史学发展整个过程中的一条红线”^[7]。这里所说的综合叙述,是指中国史学史的撰写。

由上述可以看出,尽管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上,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同认识,但都以建立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为旨归,试图通过对史学史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对象、范围、意义的重新界定,摆脱旧的体系。正如师宁所言“这些意见主要说明,我们的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史学史,建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史体系。”^[8]师宁强调指出,这种新的中国史学史体系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强调要揭示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强调要注意到史学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要注意阶级分析,联系社会的阶级斗争来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三)强调要批判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特别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资产阶级史学的斗争及其胜利的发展;(四)强调要重视历史上史学著作的思想内容,超越了过去中国史学史偏重在体裁形式和编纂方法的局限。”^[8]这说明,有关学者试图构建的中国史学史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窠臼,为研究与编写新型中国史学史在理论上作好了准备。故而,师宁进一步指出“如果上述这些特点能够在今后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中充分体现出来,那么可以相信,我们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必将逐步走上真正科学的道路,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8]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中国史学史新体系反映了1960年代的学术旨趣,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及特点。

1966年后,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建设和教材编写被迫中断。尽管如此,1960年代初有关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关于史学史基本理论的文章,与1960年代

相比,在论点上除了摒弃了那个时代极左的东西,基本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的是原来观点的重复,有的是形成于当时而发表于20年以后,有的是原来观点的进一步深化”^[9]。这表明,1960年代有关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讨论为1980年代以来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

二、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之建立

在新时期史学史学科建设历程中,白寿彝作出了杰出贡献。首先,于1980年代初提出“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重新开启了被迫中断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建设历程,并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中对《谈史学遗产》一文所提出的七个花圃作了进一步阐述,将其概括为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这比七个花圃之说更为简洁明了。其次,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史学史上应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2] P603}。这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所关注的是史学的社会作用,而此前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再者,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中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并强调指出,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的任务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其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3]《叙篇》}。这些重要认识和结论,既是对1960年代有关史学史基本理论讨论的总结和深化,也为今后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实际上,史学界同人所作的有关探讨,大多是以白寿彝的认识和结论为基础而展开的。例如,瞿林东指出,中国史学史的任务是: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官、史家与史学

成果及其特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史学发展的规律性^{[10] P24}。乔治忠认为“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和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11] P4}从上述阐述中,不难看出白寿彝的影响所在。

有关史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建设,反映在史学史研究和撰述中则表现为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从史学与社会、时代的互动中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和规律,以及史学对社会的影响。这一趋势在通史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有着充分体现。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一方面仍保留着梁启超“史学史做法”的色彩,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历史思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从史部目录解题模式向新的研究模式过渡的特征。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中国史学史著作^①,之后相继出版了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仓修良与魏得良主编《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史学史著作。然而,有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仍未脱离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旧窠臼。如葛兆光将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与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等视为同一类型,认为均未将重点“放在说明历史学发展的规律及途径上”^[12]。白寿彝也认为,1980年代初出版的史学史著作还保留着目录解题式的痕迹。他指出:“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保留了要籍解题式的影响还相当严重,这也许可以说,是史学史研究工作中难免的过程。”^{[3] P193}尽管如此,上述史学史新作已表现出不少时代新特点。如刘节《中国史学史稿》^②“注意到了对每一时期的史学面貌作出概括,同时比较重视对一定时期的历史哲学的揭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处在转变中的著作”^{[13] P37-38}。综观1980年

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曾重印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②此书撰于1950年代,1960年代作了修改,1980年代由曾庆鉴整理出版。

代中后期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已明显开始突破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撰述模式,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史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进行探讨和总结,以社会形态划分中国史学发展阶段,并阐述各个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批判地总结史学遗产,重点探讨各个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其论述各阶段史学发展时,既有总体概括,也有重点分析,并将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纳入其中,显示出开阔和开放的学术视野。当然,真正建立起新的中国史学史体系,还需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和耕耘,因而至1980年代末,白寿彝还在强调“如果建立一个像样的史学史科学体系,恐怕现在还在起步,还早得很。”^{[2](P357)}

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已基本摆脱了“旧窠臼”,并以“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为主线,综合记叙和阐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力求展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本来面貌。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可谓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撰述的特点和水平。该书纵向阐述史学自身的萌芽、发展过程,力求显示史学在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横向揭示社会变动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同时力图在阐述清楚中国史学史发展全貌的基础上,突出理论成果的积累^{[10](《导论》)}。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史纲》是“一部依据白先生的蓝图构架的,同时又博采众长的专著”,“实践了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编纂思想,表明了作者20多年学术探讨的成就,代表了新时期史学史研究的新水平,同时亦向学界昭示了史学史研究的一条新的道路”^[14]。这说明,白寿彝所期待的“新的史学史学科”业已初步建立。而由白寿彝主编、三代学者接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则将这一新体系之构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综观该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分期以及对每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重视阐发历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重视对古代史学多方面思想成就的总结,重点研究了历代史学批评及理论”;与此同时,“具体展示了白先生努力探索的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15](P216)}。

三、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

建立新的中国史学史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必须超越有关史官、史家、史籍的研究而走向更为广阔深远的领域。同时,也必须对史家、史书和史学现象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其纳入中国史学发展整体进程,才能实现从根本治学理路上突破传统目录解题式模式。

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中国史学史研究新领域不断开辟,如中国史学理论遗产、历史教育、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少数民族史学、中外史学的交流与互动、海外中国学等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其中,有关史学的理论遗产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两个新领域颇具代表性。中国史学史新体系关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史重要内容,这就要求对史学理论遗产进行发掘及总结。在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方面,瞿林东、吴怀祺作出了突出贡献。瞿林东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等文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指出中国历史理论具有多种存在形式、探索的连续性、未尝离事而言理等三个方面的特点;所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填补了有关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空白;所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从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中提炼出一系列史学批评范畴,并通过对这些范畴的梳理、分析,建立起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一书以宋代重要的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为核心,从宋代社会历史和社会矛盾出发探索宋代史学思想发展历程及特点;所著《中国史学思想史》一书对中国史学思想史进行贯通性考察,一方面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等思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以史学的“二重性”为主线贯穿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以此把握中国史学思想的特质,体现出一种纵览全局的通识。其所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作了更深入细致地发掘,向世界展示中国史学丰富的理论成就。瞿林东、吴怀祺有关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发掘,成果丰

硕,与此同时也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即从史学批评和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及特点。

白寿彝曾指出“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2] P354}“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3] P178} 受此影响,有关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的发掘已取得丰富成果,一是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研究,一是对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前一方面,在探讨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同时,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史学也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赵莜《五凉史学述略》和《五凉史学家考》等论文概述了五凉史官设置、修史情况、史家史书及其对北魏史学的影响等,并对刘昞等 11 位史家事迹进行考证,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与价值。王志刚《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对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官制度进行梳理、研究。乔治忠、王秀丽《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详细地考察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以及史学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的出版,标志着有关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研究已从零星走向系统化。后一方面,有关彝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成就卓著。例如,藏族史学,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与藏文史籍》有关藏族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藏族史学史的研究影响深远。孙林发表了《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和特征》等多篇研究藏族史学的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一书,较系统地梳理了藏族史学从起源到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以藏文史籍代表作为中心,展示藏族史学的发展和特点。叶拉太《藏族古代史论及其史学文献遗产研究》探讨了藏族古代史学的发展、史观和体系,以及史籍的收藏、价值等。此外,

有学者还探讨了《红史》《青史》《西藏王统记》《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娘氏教法源流》《柱间史》《弟吴宗教源流》《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藏文史籍的史学价值。1980 年代以来,从事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学人,既有史学史研究者,也有民族史研究者;既有汉族学者,也有少数民族学者。由于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民族语言问题,促进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有关断代史学史、专题史学史和史家、史书等个案研究,自 1980 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标志着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对于这些成果,有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作了总结,此不赘述^①。需要指出的是,断代史学史、专题史学史和个案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推动了通论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水平的提高。在多年专题和个案研究成果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等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推向了学科建设与发展新高峰。

四、有关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思考

从 1960 年代初倡导建立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到 20 世纪末以新体系撰写的高水平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出版,为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几代学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建设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过程中,史学研究者不断突破史官、史家、史书藩篱,扩大研究范围,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从而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推向新的高峰。这表明,学科理论建设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正是这些史学史研究成就充实了甚至可以说是支撑起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

瞿林东深刻指出,“‘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16]。史学史研究已取得

^①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 20 世纪的发展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新发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乔治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 年第 9 期)、钱茂伟《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史学月刊》1999 年第 6 期)等。

丰硕成果,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不断开拓新局面,这就是近年来学者所关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①。有关未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是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二是回归基础上的变革。关于已有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有学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①今后仍应该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全面提升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科学水平和学术品位。②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③加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在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的同时,也应开展中日、中朝(韩)、中越史学比较。④拓展研究视野,在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中考察中国史学史,在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⑤加强专题研究,尤其贯通性的专题研究,促进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⑥将史学运行的制度层面要素、史学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纳入史学史体系中;采用多学科方法,尤其是要吸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的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将史学思想或理论研究与史家、学派交往等活动结合起来,动态把握史学的发展与走向;加强学术史的内涵,增强史学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这些思考,视野通达,主要着眼于在现有史学史体系基础上开拓研究新局面。关于回归基础上的变革,旨在突破现有史学史体系。所谓“回归”:“一是回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本身;二是回到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建设的本身。”^[17]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有的中国史学史谱系是层累地构成的,其比中国史学本来的形态和客观历程显得宽长许多。历代有关史学发展的阐释,“不断掩蔽史学的真实面貌”^[18]。如“从梁启超到白寿彝,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认识和论定,建立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架,功劳卓著。但同时,不断深入的研究和判断也为中国史学史‘涂饰’了不少‘偏见’,这种‘涂饰’和‘偏见’既有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也有中国史学家对史学构建的自我堆积”^[17]。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有必要‘回归’到最初的原点,也就是回到‘摆脱了’任何偏见的开端,摒弃原有的理性偏见下的史学史的叙事方式,在新的问题意识及

理论视域的观照下,重新思考中国史学史中的诸问题,重新展开对史学史的书写”^[17]。所谓改革,一是变革研究旨趣,突出史学的思想本质;二是加强中国史学史自身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形成具有深度、系统的专业理论,构建中国史学史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范式;三是变革编纂方式;四是增强史学史研究者的当代意识,积极发挥中国史学史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导向作用等。有关开拓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这种思考,实际上又回到什么是史学史这个问题上来了,试图通过对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变革现有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这是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根本途径,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程已说明了这一点,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史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以上有关开拓中国史学史新局面的思考及建议,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皆有积极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关注互联网时代史学发展新趋势,也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供的条件促进学科建设。与以往相比,互联网时代的史学研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史料的存在形态与史料检索、阅读方式。一者数字化检索节省了查找史料的时间,可实现资源共享;二者史学研究的效率因此而迅速提高;三者以往学者难以涉足的问题变得容易开展相关研究。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代替纸质媒介成为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平台,史学成果传播的速度加快。同时,因获取史料的便捷与发表成果的自由和简便,降低了从事历史研究的门槛,历史研究向大众敞开了大门,历史学家已不可能垄断历史知识的话语权了,非历史专业者大量涌入历史研究领域,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专业历史研究者,历史学开始从庙堂之学走向公共之学。互联网在改变历史研究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以史料检索代替读书成了史学研究的捷径,以粘贴伪装学问,快餐式成果大量积累,等等。然而,史学史是一门具有反思性的学科,不仅要总结历史上已有的成就,更应该通过对最近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为未来史学发展指明方向。因此,互联网时代

①《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组织“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

史学的发展应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互联网、数据库也为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乔治忠利用互联网资料很快就解决了学术界争议不休的关于《越绝书》成书年代问题,他感叹道“倘若没有电子版图书、电子文献、互联网的搜讨及下载文献的资源,这样的论文大概是写不出来的,尤其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历史研究中电子资源的强大功能和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19]这表明,互联网、数据库可以帮助解决史学史研究中的难题。同时,贯通性史学史专题研究是提高史学史学科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互联网、数据库则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如关于史学批评范畴,以往的学者已经作了梳理、论述和提炼,但囿于资料,这些范畴的演变历程尚未完全清晰地揭示出来。利用互联网、数据库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既能为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也能推动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齐思和.中国史学史[J].燕京学报,1947(32).
- [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4]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J].学术研究,1963(1).
- [5]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1).
- [6]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J].学术月刊,1961(10).
- [7]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J].文史哲,1963(4).
- [8]师宁.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J].文史哲,1963(6).
- [9]姜胜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南开学报,2004(2).
- [10]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11]乔治忠.中国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2]葛兆光.谈史学史的编纂——兼评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J].史学史研究,1983(4).
- [13]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 [14]牛润珍.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J].安徽史学,2003(3).
- [15]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6]瞿林东.“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N].北京日报,2017-06-26.
- [17]王记录.回归与变革: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发展趋向[J].史学月刊,2012(8).
- [18]谢贵安.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和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J].人文杂志,2014(8).
- [19]乔治忠.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J].史学月刊,2015(1).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New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It's Influence

ZHAO Mei-ch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old system of Chinese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1940's was replaced by the new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1990's. The old system of Chinese of historiography was the stud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historians and history books. The the process of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society were the major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new system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The new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had strong pushe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to new peak.

Key Words: Chinese of historiography; The system of Chinese of historiography; The new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fluence

[责任编辑:把增强]